

海德格尔存在论观照下的陶渊明形象之阐释

李修元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 安徽铜陵, 244000)

摘要: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作为一种人生哲学, 注重人对自身的筹划、超越以及人生在世中不断生成的特性, 让人们可以看到更丰富的“人”的存在。若从这个视角中去审视陶渊明, 他就不再是一个无欲飘逸的隐者, 也不是一个矢志忠晋的臣子, 而是一个远比“此在”丰富的不断领悟思考自身的“人”。因此, 基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观, 尝试从境域、生存与超越三个层面展开来深入研究陶渊明的动态形象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海德格尔; 存在哲学; 陶渊明; 动态形象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082 (2016) 01-0094-06

马丁·海德格尔是一位关注人本问题的哲学家, 他把“存在”从湮没中提取出来恢复了其本来面目, 提出了“诗意的栖居观”思想, 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人类生存的美好图景。^[1]陶渊明则是一位哲学上具有独特感悟的诗人, 对自然与社会有着深邃的理解,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想的核心。《归去来兮辞》说: “质性自然。”《形影神序》说: “神辨自然以释之。”“自然”是引领陶渊明生活与创作的最高准则, 而“养真”则是贯穿陶渊明全部生活的人生哲学。“陶渊明对自然的返朴归真, 是对形体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双重渴求”。^[2]他所探索的不是哲学的宇宙论, 而是哲学的人生论。^[3]因此, 说起陶渊明, 人们首先得到的印象或是桃花源中的隐者, 或是恬淡自适的五柳先生, 或是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农夫, 即陶渊明是一位无欲飘逸的隐士。其实, 这也是陶渊明最初得到高度肯定的身份, 如他在《晋书》《宋书》《南史》中均入《隐逸传》, 所记事迹大都为隐士风度, 又萧统为其作传, 所记的也是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与蓄无弦琴一张等事, 这一点可以从陶集注本与历代诗评论中不断得到证实。当然也有与之不同的看法, 或说他归隐乃是愤世嫉俗, 或说它是晋之忠臣、耻事二姓, 甚至有人说他“有志天下” (顾炎武)。这种声音比起前一种要微弱的多, 但也具有代表性。以上为近代及前期中国陶渊明形象评论的两种主要倾向, 但无论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 我们得到的都是一个类型化的形象, 即陶渊明要么是乱世中的隐士, 要么是易代之际的忠臣。显然, 这种认识极具概括性而易于为我们所把握, 但也因此失去了陶渊明的真实性和丰富性, 结果是使我们对陶渊明似认识实则隔阂千里。再深入分析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 借用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中的一个术语——“本质主义”, 我们可以把这种方式归结为本质主义的认识方式。

收稿日期: 2015-11-17

作者简介: 李修元 (1968—), 男, 安徽无为,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副教授, 管理学硕士。

本质主义是指从西方思想史开端发展出来的，在19世纪末之前占主导地位的追求事物客观“本质”规律的思想倾向。一般认为，本质主义首先把世界分为差异的现象，再由此产生不同属性的“本质”，只有本质因其不变的统摄性和真实性，是“真实的存在”，而现象只是时间性之外的完全差异。同时本质主义又在另一个维度上把世界分为两个方面，一边是人，一边是客观事物。本质因人的感性而变为现象，本质主义中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就是通过人的知性和理性（本质主义认为这二者是人的本质），从纷繁变动的现象中抽象出一个本质，从而把握现实世界。事实上，传统也正是依据这样一个思路从而形成了陶渊明隐逸诗人的形象，完全符合“乱世-隐士”的认识模式，所以在人们心目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地道的隐逸诗人。这个认识又经过历代文人不断渲染而日益巩固，成为不可动摇的常识。而说陶渊明为晋之忠臣，也可以找到言之凿凿的证据：第一，陶曾祖陶侃为晋之宰辅，陶又极重其家世；第二，陶入宋后不复出仕；第三，刘宋代晋后其诗文只记干支不记年号；第四，晚年《述酒》《咏荆轲》《咏三良》《咏二疏》等诗深有不平之气。以上证据，便得出陶渊明是易代之际的忠臣形象，此中又含着一个“易代-忠臣”的认识模式。

本质主义认识模式得到的陶渊明自然只会是一个静态的、片面的形象。而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无限复杂的存在，绝不是几个标签式的短语可以概括的，更何况陶渊明这样一位多愁善感又极其敏锐的诗人。既然本质主义是一条歧路，那我们是否还有可能真实地认识这样一位历史的伟大诗人？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中找到了这种可能性。海德格尔，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他以追问“存在”为起点，以人为中心的基础本体论，正是在对传统的本质主义的批判中完善起来的。海德格尔认为西方传统哲学一直是对“存在者”即事物的本质的追问，却遗弃了对“存在”的追问，从而导致了“存在”的千古之蔽，而他认为对“存在”的追问是一切哲学的优先命题，并且他认为追问存在就必须从追问人的存在开始，因为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者，既能领悟其它存在者的存在，又能反思自身的存在，即人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海德格尔将人称之为“‘此在’”（德语Dasein或译为亲在或缘在），“此在”是“存在”的澄明之处。于是他又进一步从“现身和领会（人的基本存在状态）”“共在、‘常人’和沉沦（人性异化）”“畏和操劳（‘此在’的结构整体）”“向死而在（‘此在’如何成为整体）”“良心和决断（本真‘此在’的确证）”以及“‘此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等6个方面分析了“此在”。^{[4] 180-235}我们可以结合海德格尔的上述观点，以陶渊明的作品和主要人生经历为基础，从境域、生存、超越三个层次对陶渊明做一次展开的尝试。正如本质主义总是力求得到“是什么”，而存在主义意在“是”一样，我们无意于得到一个确定的陶渊明形象，而是把陶渊明作为存在展开，或许这样我们可能会离诗人更近。而境域、生存、超越正是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中提炼出来的“此在”的存在结构，不是三个阶段，不是逐级上升的层面，而是一种综合的相互渗透的存在结构。

一、境域

首先说境域。与本质主义中和主体对立的客体不同，存在主义所说的境域是“此在”使物呈现出的一种“境域”，或者说境域是通过人显露出来的。人在认识世界之前，与世界是浑然一体的，而人认识世界的过程也正是此人的世界——境域形成的过程。可见，人与其境域不可须臾分离，人总是处于一个特定的由己而生的情景之中，这就抛弃了本质主义中那种既定的抽象的历史背景，而还原了诗人生存境域丰富的可能性。陶渊明出身官宦世家，只可惜后来家道中落。^[5]这是一般论者在论及陶渊明的历史背景时会提及的内容，并以此为依据认为陶渊明会如此这般。但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史书上所记载的事件是否会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对陶渊明产生某些确定的影响。客观历史环境确实会对人产生影响，但客观历史环境只有在进入人的视界并为人理解才有可

能对人产生影响，其实这时客观历史环境已变为“此在”的境域，而“此在”使境域展开并显露意义，同时领会理解境域。“此在”又总是带着一种前理解去接受境域新的意义的。再回到前面对陶渊明时代的历史描述，此时，无法说陶渊明在这样的环境中就一定会怎样，还要看他在何种程度，哪些方面，以何种态度、性情理解接受了这种境域，只能说生存于这种环境中的陶渊明会接受蕴涵于环境中的某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有些会在他的存在展开过程中显露出来，有些则不会，但它仍是存在的。

下面仅以诗人早年的《命子》诗为例，试图感知一下他接受境域并获得某种可能性的过程。

《命子》前6章从陶氏之宗源陶唐氏一直写到他的祖父和父亲，其间先祖有时功德显著，有时“凤隐于林”（《命子》），其宗流一直未曾断绝。后4章专写其对儿子的期望和嘱托。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极重家风和门第，或许这正是诗人以一种以先祖自矜的心理接受了当时重门第的世风，而往后诗人常常流露出一种贞卓不群的心态，便可能与此有关。可以看出，当以一种境域意识再去看诗人时，诗人的存在就变得不再确定，因为诗人作为“此在”和诗人的境域皆有时间性，在历时中，诗人作为“此在”会有不同的展开状态，而诗人境域就会变动不居，又因为“此在”与境域这种互相生成的特性，所以境域与诗人的存在就不会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二、生存

依据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可以把“此在”的历时性理解为生存，而生存的基本状态是“存在于世界之中”，^[6]即人总是在世界之中并且与这世界融为一体，这就必然遭遇、触接事物和他人，在遭遇和触接的过程中“此在”理解事物和他人，以及领会、筹划自身的可能性。同时，由此物此人又把相关联的物与人带到面前，于是人就必然生存于境域和关系之中。在这种不断遭遇、触接、理解、领会和筹划中，总是实现了一些可能性，耽误和错过了另一些可能性，同时海德格尔还把“此在”对可能性的筹划称之为“操劳”，把“此在”陷入操劳之中的状态称之为“沉沦”，而“畏”又把“此在”从沉沦中带回来，重新面对自身。当再以这样一种充满可能性的生存意识去品味陶渊明的作品和人生时，就有可能更加真切地领会陶渊明曾在他人人生旅途的每一个岔道口所做的选择，以及选择时的彷徨、焦虑、苦闷、坚守和他偶尔因“畏”而退回自身而达到的超然境界。

首先来看他的行役诗。一般认为，陶渊明在中年曾多次出仕，其中曾任桓玄幕僚，刘裕参军，刘敬宣（建威将军）参军，这3次出仕让诗人东游西走，饱尝行役之苦，他的行役诗篇也主要写于这个时期，在他36岁到41岁之间，以时间为序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杂诗》中有三首、《始作镇军经曲阿作》《己巳岁三月为建威将军使都经钱溪》。“自古叹行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而今诗人又叹，上述诗篇无不充满着诗人在任职奔波中的焦虑不安，诗人是“一心处两端”（《杂诗》），一端是想实现出仕有所作为的可能性，一端是发现了商歌之事非吾所能之后的悔恨以及对“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这种可能性的向往。诗人在世因与世之关联而出仕，沉于行役，又因对行役之苦的理解，从而领会到自己的另一种可能性，即“静念园林好”（《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在此过程中即蕴涵着丰富的诗人对自身的理解和对自身可能性的领会的内容，如《始作镇军经曲阿作》中“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其实，所“惭”所“愧”之“高鸟”“游鱼”就是理想的本真自我。诗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就筹划实现这种本真的可能性。在这里，“惭”和“愧”就有“畏”的成分，它把诗人从沉沦于对非本真可能性筹划的状态中带回，迫使诗人面对自我重新选择，重新选择的结果就是诗人41岁那年八月上任彭泽令，十一月即挂印归去，从此“归园田居”。许多论者把此作为陶渊明一

生的分水岭，这很容易使人们认为陶渊明从此归隐田园，过上了他恬淡自适的隐士生活，其实这完全掩盖了诗人后期人生经历和思想过程的丰富性。我们认为诗人辞去彭泽令后平静的田园生活只是诗人后期人生具有过渡意义的短暂时期，并不成为他晚期人生的典型状态。为此，我们可以从他归隐第二年写的《归园田居》组诗中来寻找这种过渡意义。《归园田居》共5首，前三首最为有名，描写了诗人“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之后的欣喜以及亲身从事农耕之后的真切心理，语言质朴直白而又晓畅动人，为历代诗评者称道，以至成为认定陶渊明为田园诗人的主要依据。而我们认为《归园田居》后两首对分析诗人的人生转折经历更具意义，《归园田居》其四，记载了诗人一次山泽之游的经历，诗人于丘陇之间看见人居的井灶遗迹，而人却死寂无余，因而感慨“一世异朝市，此言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五，似写这次野游还家后滤酒杀鸡，与乡邻欢饮至天明的过程。有深意处在“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濯足”典自楚地民歌谣《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可见于屈原《渔父》《孟子·离娄上》，历来是文人贞洁自身的象征。陶渊明入宋之后颇有固穷之节，又写有《咏荆轲》《咏三良》《咏二疏》《读〈山海经〉》中的《精卫衔微木》等慷慨不平之诗，其因于此可见一斑。只因为刘裕代晋的境域的展开，使陶渊明在这的这种可能性得到了实现。而《归园田居》其四，当是在诗人过了一段寂静的田园生活之后看见人、物变换而产生的对人生深层的哲学思考，“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陶渊明不信佛，他所谓“幻化”“空无”决不同于佛家的色空观念，而是诗人在目睹了人生飘忽而逝的过程，感知了人的整体存在，从而产生了“畏”。前面说到，“畏”让人超出现实存在，触及存在之外的“无”，而“无”总是启发着人的形而上的即哲学的思考。

陶渊明曾经还写过一组结构非常奇怪的哲寓诗《形影神》。《形》诗云：“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影》诗云：“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詎不劣？”《神》诗云：“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很多学者都认为《形》《影》二诗是陶渊明所批判、扬弃的人生观，而《神》诗是真正代表了陶渊明的人生哲学。这种解释无疑是脱离了《陶渊明文集》的文本事实，非常主观恣意的。我们认为“形、影、神”三首诗都反映了陶渊明真实的想法。“形”就是《饮酒》中的“一士长独醉”，“影”就是《饮酒》中的“一夫终年醒”。除了“醉、醒”两种人格外，陶渊明还有第三种人格：就是“委运”。也因此有人认为诗人口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而实则于死未能忘怀。但我们认为，诗人正是因“死”而到达对人生的整体观照和思考，是诗人因“畏”而产生的对本真状态可能性的积极筹划，并非常人对死的畏惧。袁行霈先生认为陶渊明不但是诗人还是一位哲人，这极有见地。^[7]因为哲人是陶渊明某种可能性实现的结果，而于《归园田居》（其四）这次山泽之游而生的人生感慨中可见端倪，诚如清代诗人龚自珍说的“莫信诗人竞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8]诗人在与境域的交流中形成了他的现实状态，在筹划和“畏”的过程中完成着他的存在，这种形成和完成是一种综合式的生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动态的陶渊明。

三、超越

海德格尔认为，“死”作为“此在”的终结，是“此在”最“本己”（完全属于自己）的可能性，^[9]所以对“死”这种绝对不可能的可能性的感知，让人真正面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并摆脱一切世俗关系，唯剩真实的自己，此时，也唯有此时，自身才是有独立人格的自由的人，也就

达到本真状态。这个过程称之为“向死而在”^{[4]208}的超越。汉末魏晋以来，虽天下多故，人命维艰，但从曹植到嵇康、阮籍几代知识分子莫不对生命怀有极深的眷恋。他们爱生而恶死，面对荒草白杨，万古高坟，心中充满怅惘，并且执着地想利用不同方式，求得生命不朽。曹植《赠白马王彪》云“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咄令心悲”；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亦感叹“生若浮寄，暂见忽终”；阮籍《咏怀》中，“人生若尘露，天地竟悠悠”一类诗更可随上可见。然而，他们的遭遇和他们的愿望总是相互抵触。特别是思想上已有相当自觉，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阮籍，虽然向往自然，渴望长生，但迫于政治环境的压力，他亦不得不以佯狂饮酒、沉湎醉乡来排遣苦闷，表达反抗。这样，他们的本心和实际行为，彼此相距极远，像阮籍长在醉乡，悒悒而亡，又何尝不是醇酒伤身之故。所以陶渊明对他们这种本存长生保身之念，所为却适促其早夭的前后相悖不以为然，以为是“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何况从宏观的自然角度来看，任何养生摄形之方，亦都不过是“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化其宝”而已。

而陶渊明则是一位因对死的感知和领悟而超越现实存在达到本真状态的诗人，一是亲友的死，一是自己必然将至的死。从他的诗文作品中可以看到对他产生影响的亲友之死有：30岁丧妻，37岁丧母，41岁丧程氏妹，47岁丧从弟敬远，并写有《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这两篇祭文除对死者的悲痛哀悼，还有一种对死的基本领悟，即死则永已——再无其它任何可能、已绝对完成了作为整体的存在。这不能不让诗人反观自身，深刻感知领悟到自身的必死性，这种感知领悟的结果是我们看到的《挽歌诗》三首及《自祭文》。在经历了一生的曲折、求索、操劳之后，诗人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死亡，并由此而知一切社会关系的有限性，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唯一承担者。死就是我们必须各自承担的命运，也是我们的最后完成。死的这种必然性和终结性迫使我们更自觉去选择自己的人生，更珍惜自己人生的可能性，更慎重对待并严肃思考自己人生的可能性，而诗人也就是一生中不断触及死的命题，让他对自己人生的思考没有停息，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不断超越自我。而最后《自祭文》所体现的应该是诗人对自己一生最彻底的思考，诗人设想自己已经死去，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已完成的整体，并总结自己这一生，从操劳到安然于死，每一刻都在追寻自己当时所认为应该的生活。诗人最后一句“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更让我们确知诗人一生是不断严肃求索、思考自身可能性的一生。“人生既已完成，死去又会如何呢？”这是诗人“余得为人”（《自祭文》）后最激越的一次对“为人”的思索。

通过上述关于境域、生存、超越并结合诗人一些作品和人生经历的分析，可以感知到诗人的所悲所喜，所忧所安，但无法得到一个确定的形象，因为对境域和自身的不断领悟和筹划，诗人总在不断生成新的特质，这让人无法用一些静态的形象去概括他，如果用了，那就必然意味着对诗人作为“此在”的丰富性的遗弃，这也正是本质主义认识方式所难以避免的缺陷。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作为一种人生哲学，注重人对自身的筹划、超越以及人生在世中不断生成的特性，让我们可以看到更丰富的“人”的存在。于是从这个视角中去看陶渊明，他就不再是一个无欲飘逸的隐者，也不是一个矢志忠晋的臣子，而是一个远比此丰富的不断领悟思考自身的“人”！从他读书闲居的早年，到为行役而苦的出仕阶段，以及归隐后的中年晚年，他都一直在追寻适合自己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有趋于真和自然的倾向，这又可以找到与海德格尔存在哲学追求人的本真状态的内在相通之处。

参考文献:

- [1] 崔晖.海德格尔的栖居观与陶渊明隐居观比较研究[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6,(14):6.
- [2] 朱光宝.中国文学史教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288.
- [3] 冯友兰.人生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7.
- [4] 徐崇温.存在主义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5] 杜景华.陶渊明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7.
- [6] [美]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海德格尔[M].张祥龙,林丹,朱刚,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21.
- [7] 袁行霈.陶渊明的哲学思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
- [8] 王树占.周紫芝辞赋创作研究[D].济南:济南大学,2008.
- [9]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307.

(责任编辑 林曼峰)

Interpretation of Heidegger's Ontology View of Tao Yuan-ming's Image

LI Xiu-yuan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Tongling Polytechnic, Tongling, 244000, China)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philosophy as a kind of Heidegger's life philosophy, focusing on their own planning, transcendence and continuous formati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can be seen more "human" existence. If from this angle to look at TAO Yuan-ming, he is no longer a hermit without lust, neither a loyal subject to Jin dynasty, but a person continuing to grasp his own thinking far richer than "Dasein". Therefore, based on Heidegger's existence philosophy, researching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circumstances, survival and transcendence, the paper reveals the dynamic image Tao Yuan-ming, which is of significance of methodology.

Key words: Heidegger;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Tao yuan-ming; dynamic image